



西藏文史資料選輯

標初題

22

西藏自治区政协法制民族宗教文史委员会 编

民族出版社

西藏文史資料選輯（二十二）

林初道

西藏自治区政协法制民族宗教文史委员会编

民族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西藏文史资料选辑. 22 /西藏自治区政协法制民族宗教文史委员会编. -北京:民族出版社,2005.7
ISBN 7-105-07173-7

I . 西… II . 西… III . 文史资料-西藏
IV . K297.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5)第 082153 号

XIZANG WENSHI ZILIAO XUANJI(22)

民族出版社出版发行

(北京市和平里北街 14 号 邮编 100013)

民族出版社微机照排 迪鑫印刷厂印刷

各地新华书店经销

2005 年 8 月第 1 版 2005 年 8 月北京第 1 次印刷

开本: 850×1168 毫米 1/32 印张:10

印数:0001—2000 册 定价:16.00 元

该书如有印装质量问题,请与本社发行部联系退换
(总编室电话:64212794;发行部电话:64227665)

目 录

回忆贺老总召谈解放西藏	任乃强	(1)
争取和平谈判进军西藏的历史回顾	杨一真	(14)
中央布置进军西藏的历史片段	杨一真	(64)
西北进藏的后勤工作	肖 生	(89)
怀念孙志远“和谈”做贡献	刘立君	(104)
上书毛主席 建设新西藏	魏 克	(110)
进藏先遣支队进军简录	高 松	(122)
十八军先遣支队进军拉萨宿营报告 实录	杨一真	(137)
从拉萨入城式回忆进藏部队先遣团	刘广润	(148)
进藏先遣部队驻扎边防时的回忆	刘广润	(172)
一路进军一路歌	冀文正	(184)
川藏、青藏公路通车前的西藏运输 总队	龙 忠 郭效孺	(198)
十八军从甘孜向拉萨进军时阵中日记摘抄	杨一真	(203)
建立巴青县解放委员会 解决朱角地区土匪 问题	崔善才	(242)
1952年前后我在阿里	郝广福	(257)
在江孜做群众工作时	雍 丕	(265)

不是妈妈 胜似妈妈

——忆西藏军区原川办五六十年代保育院的师生情

..... 郭效孺(279)

西藏地区海关设立过程 侯彦昌(282)

20世纪50年代拉萨海关各设关点的地理、贸易

概况 侯彦昌(293)

情深喜访故友家 魏 克(302)

心香一瓣寄徐公 王富荣(308)

回忆贺老总召谈解放西藏

任乃强

1949年12月，四川全面解放，1950年元旦，解放军整队进城，那时川大还未放寒假。有一天下午，我正在课堂讲课，助教邱俊杰从系办公室来说：“解放军李夫克同志在办公室等你谈话。”我结束了讲课，回到办公室，会见李夫克同志，才知道他是来向我征求有关西藏问题论著的。农经系同事们已经把《西康图经》三册，从图书室提供给他了；他又同我回藩署街家里，取去了《康藏史地大纲》、《康导月刊》、《康藏研究月刊》各一份和已经绘好的五十万分之一康藏地图。他说：“人民政府有令，解放四川后，即进军解放西藏。”一野总部访得我是研究西藏问题的人，故来“征求资料，准备着手研究。”我欢喜地尽量提供了一切。

李夫克去了不久，又回来说：“贺老总看了地图，很喜欢，派他自己的车子，来请你去面谈。”我不胜惊喜，因我当时衣服破旧，想换了衣服再走，李说：“贺老总已经知道你的生活朴素；他就喜欢生活朴素的人。他在等你，不用换衣服了。”于是我仍旧穿着破毡鞋旧长袍戴着绒瓜皮帽，上车同去。

到了一野总部大客厅，只一位李秘书在。说贺老总们还在开会，快要完了，叫他在客厅招待。李秘书似乎迫不及待地要我先谈一谈，我刚开谈不到五分钟，那边已散

了会，贺老总同一大群干部都到会客大厅来了，大约有三十多人。李夫克只引我介绍了贺老总。后来知道，那天在座的有李井泉、廖志高、李大章和胡耀邦等同志。我们足足谈了两个多钟点。

贺总和蔼可亲，虚怀若谷，细致地提出许多问题，就好似在与我商讨一样。那种爽朗而真挚的丰仪，和谦虚而诚恳的态度，令我十分感动，终生不忘，现在还明晰地记得当时的情景。

贺总先问：“你看解放西藏，应该注意哪些问题？这是我们大家的事，请就你的看法，爽快提出来，我们大家研究。”

我说：“红军长征，是经过了这个高原的东部的，经验比我丰富。我试就研究所及，提出几个困难之点来，请求指正。”

贺总笑嘿嘿说：“你就直接说好了”。

于是我放胆说了：我们内地绝大部分地方，平均海拔皆在 600 米以下。一般的大山，如泰山、嵩山，最高处也才一千多米。特殊的高山，如峨嵋、太白，也不过三千多米。西藏和康青这个大高原，却绝大多数是海拔 4000 米以上的草原；随便一条山脉都高出 5000 米以上，低于 3000 米的河谷，便是悬崖绝壁的峡江，几乎没有通路。在这样高的大高原上，不只是气候寒冷、供应给养困难的问题，更有空气稀薄的威胁，一定容积的空气中，含氧气比内地少，因而与内地人的肺活量不相适应。就我所知，清雍正、乾隆时入藏部队，与清末赵尔丰的边军，和解放前陈遐龄、刘文辉等经边部队，绝大多数不是死于战斗而是

死于“晕山”的。所谓晕山，就是因为负重的人，不懂海拔高空气稀薄了的道理，仍像在内地一样奋力爬坡，到了体内热能已尽时，不知不觉，未感痛苦就倒地死去了。内地部队到这高原上作战，气压与肺活量不相适应。惟有历世居住在这高原上的藏族人民，则是能与这样的气压相适应的。在汉藏双方剧烈战斗时，汉人军士比藏人军士就输了这一筹。这是高原作战困难的第一点。

但这一点是容易克服的。首先是要检验入藏部队的身体是否健康，要选拔没有肺病、心脏病和神经衰弱的人。其次是须要保持轻装、缓步；从容办事，慢慢锻炼身体，使与地理环境相适应。作战时，最要紧的是不容轻进轻退，要能坚持稳定的阵地战。必须有骑兵与步兵配合。现在已有公路通到巴塘和德格，可以车运辎重，更是易于解决气候不适应的困难了。只须入藏官兵先有这样一种生理关系的认识而已。

入藏行军的最大困难，在于语言障碍。内地人民，备受三座大山压迫，人人痛恨蒋匪帮，盼望红军胜利，如大旱之望云雨。红军所至，皆能深得人民协助，所以能以小米加步枪打垮蒋匪帮七百万美式装备的部队，解放全中国。若论西藏叛逆势力，其不得民心是更甚于蒋匪帮的。他的军队实力，更是不值一击。但由于民族间习俗不同，语言隔阂，解放军的爱民行动在那里无所施展；藏民的云霓之望，当着面也无从表达。因而在西藏高原作战，解放军只能有步步荆棘之虞，没有内地作战那样得民众协助之望。譬如：在内地对蒋匪军作战，侦察蒋军行动，处处可得人民协助。作战转移中的伤员，也处处能得到人民

的掩护和医疗。蒋匪军就不能取得这些便利。但若在高原上对藏军作战，就由于语言隔阂，无法与藏民通情达意。藏民虽向往解放军，也无法接近。解放军要侦察藏军行动，就难乎其难。迷路掉队的战士或伤员，就不可能取得藏民的援助。若再有一两支能说藏语的支队配合入藏那就方便得多了。但这是当前还不可能有的。当前只能多多征募能通藏语的人员参军，进行教育、训练，协助解放军作战，借以克服语言隔阂的困难。现在金沙江以东的四川有 20 万平方公里的藏民住区，都是早已脱离了西藏统治，拥护解放军政权的。他们之中多有能兼通汉藏语的，至少有一千人可以征募拢来，协助进军。其中有些人是旧官府的“通司”，染有藉官磕索，鱼肉人民的积习，所以征募到时，必须集中加强教育，使他们的脑筋转变。待遇宜优厚，管理宜严格，惩奖要认真。否则他不但不能宣扬解放军解放藏民的德业，反而会造成藏民对解放军的误会（另外还谈了些通司舞弊的实例）。

我还建议：未来的驻藏部队与其他工作人员，要普遍学习藏语和研究藏俗。要多多吸收藏族青年参加解放军，参加工作，让解放军的汉族战士与藏族青年混居一队，互相学习，逐步培养成为兼通汉藏语的解放军战士。至于培养藏文翻译人员，就更不用说了。

于此提出入藏行军第三道困难，即最大一重困难，是汉藏文化上的基本矛盾。那是单凭军事力量还不能解决的矛盾。我认为解放西藏的工作，必须着重考虑这一点。考虑到喇嘛教（即藏传佛教）的潜在力量。喇嘛教统治西藏人心，已经一千多年，深根固柢，牢不可拔，这是事实。

喇嘛教理论和设想是唯心的，它与辩证唯物的马列主义，毫无共同之点。我们要解放西藏受压迫的农奴和牧民容易，要解放西藏上层人物的思想情感甚难。但在当前我们还不能直接管理广大藏族人民的时候，还不能不通过旧有的西藏统治阶层来慢慢进行民主改革。我的看法，解放西藏的第一步，还只宜做到收回和稳定国家的主权这一步。解放农奴和受压迫的西藏人民，与如何推动社会前进的工作，尚有待于语言、文字的隔阂基本打通以后，随着科学文化浸润、滋长，经济建设逐步开展，藏民生活方式的逐步转变，在藏族自觉的情况下，慢慢推行起来。即是说，不可把西藏与内地等同看待，不能随着军事胜利就立即推行民主改革。因为，它是一个喇嘛教深入人心的地区，是一个有着自己语言文字的民族地区。

希望解放军进入藏族住区以后，要保护寺庙，尊重高僧，宽容土司头人，争取他们对解放军的信赖。这样表示军人尊重民族本俗的鲜明态度，对于解放西藏的军事，才会顺利收功。

贺老总问：“我们宣布信教自由，已行了吧”？

我还盼望再提高到尊重喇嘛教旨，保护寺院和僧侣，维持民族旧俗这一步来。我举了许多历史事实作说明。述说了汉唐两代，武力虽强，未能征服这个高原，反受到高原人民的困扰。元、明、清代，因其俗而治之，就能建成统一的版图。清自乾隆时已把西藏政权收归驻藏大臣管理了，结果是由于语言阻隔，并未收到管理西藏的实效。清末赵尔丰经略川边，军事、政治方面都是成功的，只由于他和他的边军憎恶喇嘛教，激起藏民的疯狂反对。结

果是人亡政息，一切化为乌有。刘文辉被刘湘联合的军阀们打得一败涂地，只剩下川边关外十几县赔钱的藏族地区。他的政治生命已到垂危的时候了，他玩出一套“弘扬佛法”的花招，便能稳住阵脚，慢慢又爬起来。他到西康后，首先在自己住宅布置一座经堂，迎请阿旺勘布·格聪活佛、日枯古学等有名望的喇嘛为他讲经修法。自己随时也拿着手摇转经筒旋转，口念“喔、嘛、呢、叭、咪、吽”不绝。那几个喇嘛替他宣扬出去，说他是真正的护法韦驮转世。他的师长曾言枢首先带兵出关，更是完全的一套喇嘛装束，喇嘛行动，军士们叫他做“曾喇嘛”。这样一来，于是几十年不能到任的县官，也次第随军到任了。抗粮几十年的县，也自动迎官输粮了。素来不肯出寺见官的高僧、活佛，都枉驾来到康定参加刘氏召开的佛教弘扬法会了。西藏地方政府也派代表来商谈和平相处的条件了。由于地方人民拥护他，他未用一兵一卒，就把康区局面稳定下来，使蒋介石无法把他吞下。这是我亲眼看到的事实，刘文辉的这一做法，虽然是不足为训的，但用来说明因势利导的效果，却是很有益的。

这里恰好引证司马迁在《货殖传》所论述移风易俗的一段话。他说：“俗之渐民久矣。虽户说以妙论，终不能化。故善者因之。其次利道之。其次教诲之。其次整齐之。最下者与之争”。他这段话原是说“至若诗书所述，虞夏以来”中华内部社会发展习俗转变的过程中，政教措施效果的大小好坏，颇有一定的道理。对于不同语言文字风俗习惯的民族之间的政化措施，无疑是更应当要重视这个道理。这是个人管见，谨提供进军西藏各领导的

参考。还说：“我不是佛教徒。刘文辉在西康，文武僚属没有不皈依喇嘛的。未肯皈依喇嘛，不去参加法会讲诵的，只我一个人”。用来表明我不是为喇嘛教说项。

贺总与全体干部听这段话，不发一言，也不表示任何态度。还是贺总说：“关于宗教影响的事，就谈到这里。请另谈解放进军的路线问题吧！”

我说：“西藏的正规军队，有 11 个营，分统于 11 个代本。实际上都不足额，战斗力都不很强。就历史经验看，他经常要留一营常驻拉萨，两三营分驻西藏地方。历次东犯所用的部队，不过七营以内。四川与西藏两军，多年都是划金沙江分驻的。这段金沙江，长千二百公里，水流湍急，只用皮船横渡。每船只载得几个人。要斜漂到一里以上才能划到对岸。只需有一支步枪守在对岸射击，皮船就会沉没，无登岸之望。若两军夹岸，谁要抢渡，都是万分困难的。

估计解放大军入西康后，藏军必然集中兵力扼守金沙江各渡口。千二百公里中，有几十座渡口，都得防守，他的兵力不能不分散。我军声扬从多处渡口抢渡，待他兵力分散以后，才集中威力从一个渡口抢渡。那就不难突破金沙江防线。一点突破，他的全线都会崩溃；也必然退守昌都，那是西藏经营东方西康地面部署了几十年的兵要重镇，分驻噶伦一员在此指挥军事的地方。他们是必然要企图死守的。

我军前进困难，在抢渡金沙江后，要攻占昌都，便如瓮中捉鳖，是可毫不费力的。因为昌都东边的岸山，绝壁顶上不是险峰而是与草原相接的坦途，

敌军无法守住。我军占领东山，俯临昌都市，正如俯看围墙下的院落一样。只需几响迫击炮就会摧毁敌军营地和喇嘛寺与整个市场。但我建议大军占领昌都东山后，只用藏语喊话说服昌都噶伦，派员进行和平谈判。并容许他向拉萨请示，促成和平解放西藏。只要达赖喇嘛愿意取消独立，回复前清旧制，容许和平进军，巩固国防，那就省却高原作战的麻烦。稳定国家领土的主权之后，在民族融洽之下协商推行新政，慢慢进行改革，就好办了。

若还藏兵执迷不悟，稽延不答，非得用兵不可，则宜先从青海玉树编组一旅骑兵，每员配备两匹快马，携带十天食粮和用具，轻装疾驰，从当拉山中（唐古拉山中），黑河、当雄、羊八井一路，抢过曲水的雅鲁藏布江渡口，在南岸建设阵地，布置游骑，防制达赖喇嘛与其亲从逃向印度。然后从昌都进兵拉萨。在我军尚未进取昌都以前，达赖是不会出走的。他的十一营正规军，必然都要调向东方，企图固守昌都。对青海草原这方面，布置的兵力必弱。例如黑河，也是藏北一个重镇，但那里并无险阻可以扼守。我们的骑兵，不去攻占城邑，只取道驰过，藏军无力制止。当雄、羊八井、曲水等处只有民兵守卫，那是不能发生截阻效果的。西藏民兵虽多，大都只有明火枪和刀矛、弓箭，有快枪的很少。他们都不愿为奴隶主出死力。奉令守着隘口的，便只保持隘口不失守罢了。对于轻疾飙过的骑军，不会起扼阻的作用，所以一旅精锐的轻骑，可以纵驰藏境。直到渡过雅鲁藏布江南面建成营地，达赖无可奈何。

若还从青海方面，更有大军随轻骑，虚张攻势，则轻骑更容易深入到雅鲁藏布江南面去，截断达赖逃奔印度的路。截断达赖南奔印度的路而不进攻拉萨，则达赖必能派遣代表商谈，接受和平解放的条件。

若还我军不留这点余地，渡过金沙江就取昌都，就向拉萨进军。达赖等人自然无力抵抗，但他们必然会在大军尚未抵达拉萨之前向印度逃跑。他若跑到印度，就会受到英帝国主义的利用，造成国际上许多麻烦。这是有_多次历史教训的必然趋势。以下举了几个历史教训：当清末荣赫鹏率英军侵略我西藏时，达赖本是仇英的，他布置藏军节节抵抗。在江孜的最大防线崩溃后，达赖恨清廷不帮助他抵抗，便从青海、蒙古，准备逃奔俄国。被清廷饬军截阻，才到了北京。荣赫鹏与驻藏大臣和商上签订的拉萨条约，由于达赖未签字和清廷不批准，便成了国际上不能生效的一张废纸，这才保持了我国对于西藏完整的主权。

跟着清廷派赵尔丰经营川边，派钟颖率新军进藏。一时西藏建省的声浪很高。由于赵尔丰与钟颖这批人无视喇嘛教在藏族人民中的潜在势力，轻蔑达赖，未提防达赖突然向印度逃跑去了。虽然他的逃跑无损于中国的主权，也不能影响我对西藏的设施，但他仍能暗中策动藏中部分人物的骚动。临到辛亥革命，清朝灭亡，钟颖是满族人不能指挥新军，那时英帝国主义帮助达赖指挥藏人驱逐钟军，闹西藏独立，至今（大陆解放初）未能收拾。这次解放西藏进军，攻取拉萨诸城邑，是不难的。若还逼得太急，达赖自知无力抵抗的时候，必然又要向印度逃跑，企

图再得到帝国主义的帮助，等待复辟。所以我期期陈论到这一点，希望解放大军注意。

贺总又问金沙江渡口情形。

我举出：邓柯县境水较平缓，但公路未通，对岸有春科喇嘛寺，藏人必有重兵守护。德格与巴安（即现在的巴塘）两县，当时已通公路，后勤供应较便，德格的卡松渡还未通公路，冈拖渡口的后方有龚丫村的现成营房，为藏方视界所不能到，很适合于扎为抢渡营地，准备抢渡工具。对方的防江营地，只能扎在岸山后的矮坝村，江岸掩体战壕是经不起炮击的。若还我军在龚丫准备好抢渡，突然推出一排炮火，击毁对岸守军工事，压住敌人火力，便可用皮船和木筏抢渡一批战士过岸，建成桥头阵地。跟着载过电缆铁桩，建成斜跨江面的索桥，用木筏缘缆运载大军过江。敌军待援迟缓，必然溃退。只要突破这一点，敌人沿江守军都会退走昌都。来不及层层布防，我军便如进入无人之境了。德格以南，白玉、三岩、巴安、得荣等县，渡口虽多，地形险逼，殊少有利于抢渡之处。例如巴塘的竹巴龙和牛古渡，水势都较平缓，后方也有公路。竹巴龙并且是几百年来川藏间的台站大道，但岸山对峙，无后勤掩蔽之所，抢渡是很困难的。牛古渡比较好点，它距茶树山比较近些，可以从茶树山安排抢渡的一切设备。若还安排南北两处一齐抢渡，两路进军，则冈拖与牛古两处是最适当的。

贺总问我绘制地图的可靠性。

我说：“五十万分之一康藏全图，是用印度测量局绘制的十万分之一喜马拉雅山区与西藏部分地图作蓝本，

按经纬度定点，用圆锥投影法，分幅绘制的。参对过斯文赫定、罗克西尔、荣赫鹏、高伯克、柯尔斯、台克满等人的实地考查路线图，全都是符合的。更还有赵尔丰作四川总督时，调派四川陆军测量局人员实测的从巴塘至昌都、硕板多、拉里、工布江达，到拉萨，再由曲水渡雅鲁藏布江到江孜、日喀则一路的十万分一缩尺路线图，和刘文辉请四川陆地测量局实测的西康部分地图，与谭锡畴、李春煜测定的二十万分之一川边地质图，及我自己考察绘制的各县地图纂合制成的。所有地名部位完全可靠。也收集有很多处测绘高点，绘有等高线，表示地形；那不是完全绝对可靠，只有些重要地点部分是绝对可靠的。全图依经纬度分割为二十几幅，现只有两幅还未绘成。”

贺总是曾率红军通过巴塘、甘孜到达陕北的将领，先看到李克夫拿去的地图，具有好的概念，听我说到此时，他兴奋地说道：“我接收了胡宗南的测量队和四川测量局的人员，正无用他之处。从今晚起，就全部拨给你使用，赶快把全图绘完。愈快愈好。”

我要求请假一天，到文教委员会去把我写的《张献忠》那部小说申请立案的问题办了，才开工绘。贺总不许。他说：“那个我给你办。你必须今晚就作安排，明天就开始绘图。”还立即把文委会主任委员杜心源同志请来，当着我对他说：“任先生有申请立案的事，请你替他办一下，让他把时间腾出来绘地图。”杜心源去后，贺总招呼：“大家随便闲谈。”

只有李井泉、廖志高两位同志和我问答过两句。贺总对我说道：“我们共产党，对于党内党外都是有错必纠，

有功必奖。比如你们四川的张澜，他做过道尹和省长，必然是一个大地主嘛，现在我们却推选他作副主席。……”

我是个不识世故，口无遮拦的人。当时截断贺总的话头说：“总司令误听谁人的讹传了。张先生是我们南充人，我知道他很多。他作川北道尹和四川省长时，全家还是西充王姓的佃户，张师母还与他的家人上山下田操作。张先生作成都大学校长的薪水，才用来在南溪买了一份庄田，那时节他已快七十岁了。他是古今最清廉的官，与其他道尹省长不同，更不能说他是大地主。”

于是会场静下来了。贺总宣布散会后，仍嘱李克夫送我回家，并立即安排绘图工作。两个测量队共四十多人，由我一人供稿，我无法应付。乃只留6人，在我家绘制五十万分之一康藏图的未完部分，其余的人留在皇城旧测量局内翻绘旧图。经过大约20个昼夜的辛劳，先把清末测绘的，自巴塘到拉萨、日喀则的十万分之一路线图，缩绘为二十万分之一的地形图。由我分幅加以说明，交上去。贺总立即付印，分发给部队了。五十万分之一的康藏全图绘成后，贺总不在成都，一野参谋处准备付印分发。我因为那原是上海大中国地图公司董事长顾颉刚与我订约，由他出钱资助我绘制的，按契约出版权应属于他。请求先行商得他的许可再印。那时李克夫已出勤离开成都，总部另派的江参谋和蓝科长与我联系。由于解放军干部不承认版权问题，曾经发生误会。经我把原签的合同，与顾颉刚的来信，请江蓝二人拿去给参谋长看了，才准许不印，并在使用后交还我，给顾颉刚寄去。

后来解放西藏进军的任务，交给张国华军长。贺老